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西北史札

XIBEISHIZHA

汪受宽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西北史札

XIBEISHIZHA

汪受宽 著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北史札/汪受宽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14 - 648 - 3

I. 西... II. 汪... III. 西北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K294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3115 号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西北史札

汪受宽 著

责任编辑/马映峰

封面设计/洪 波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 - 8454870

网 址/www.gswenhua.cn

经 销/新华书店

刷/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1648 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549 千

印 张/21.875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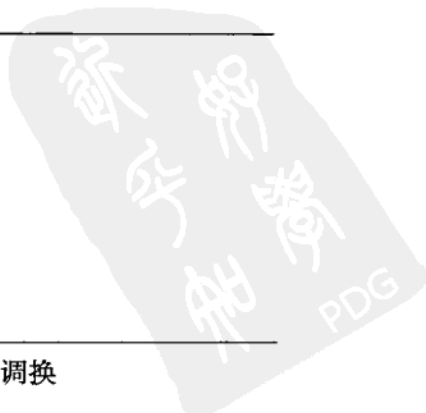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1 - 10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714 - 648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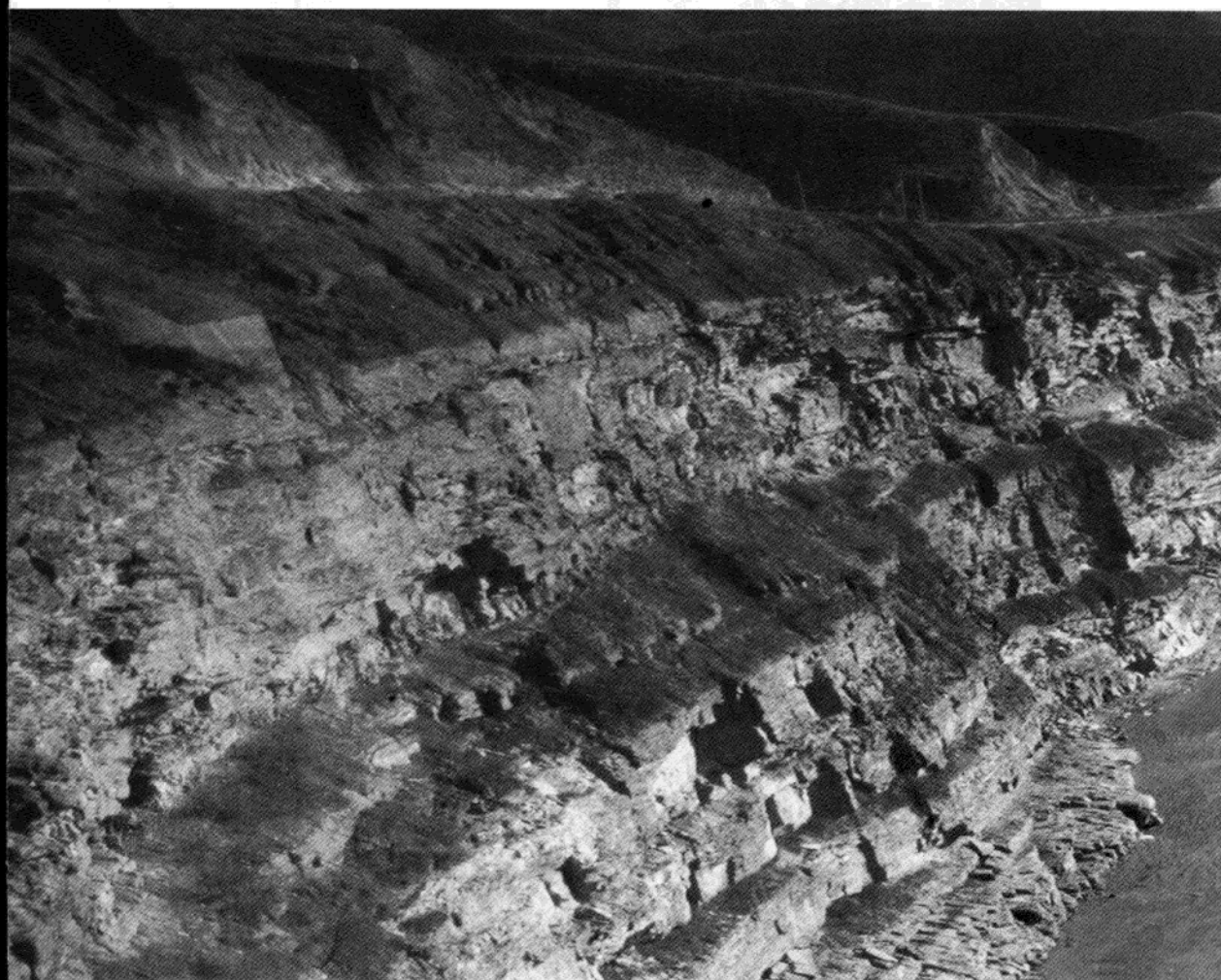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兰州大学“985 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西北史地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只有熟通西北史地才能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老一代专家贡献突出,成果斐然,主要体现在中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古代民族关系、区域史等方面。特别是在敦煌学研究平台建立之后,进一步支撑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使西北史地文化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西北史地文化研究与敦煌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驻所研究。通过以上渠道,近年来研究所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此外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与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与耶鲁大学共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便与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研究所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等大型图书,以及近年或者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图书采购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目前,研究所藏书达六万余册,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同时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 research 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留学生和中国港台地区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

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等。对留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也有很大促进,目前留学生培养已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较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尤其是培养的日本留学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产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研究所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已基本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基地。

中国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优势,特别是老一代专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刊布出来,敦煌学研究所决定以“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名义结集出版,供学术界参考。

自序

能厕身《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的作者之列,我十分荣幸,也诚惶诚恐。因为,其他几位作者都是我讨教了数十年的师辈,刘光华、齐陈骏两位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还给我讲授过中国古代史的课。在师尊面前,学生惶恐尚且不暇,岂敢充当“王婆”,自卖其瓜。而且,虽说以历史作为专业已经43年,但从1966年到1977年的12年中,我却什么学术工作都没有做过。三十多岁了才返校当“回炉生”,再当研究生,1981年才正式发表学术论文,混迹于历史学界仅25年!我诅咒罪恶的“文革”。不过,那十几年的折腾,又使我遭际了太多,成熟了许多,脑袋长到自己的头上了,这种人生感受及其结果对一个历史学者不能不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是花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本论文集之所以用《西北史札》为名,一是由于其中所收文章,以西北为限,不包括我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文字;二是由于其中收录了一部分我参议政治,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撰写的有关西北和甘肃的研究报告及有关文章。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文集既然是纵探西北历史和横议当代社会的思想的交汇,所以确定了这个有点笼统的书名。

我10岁痛失父怙,小学毕业就离开故乡,投靠“支援大西北”的姐姐来到兰州,大学毕业后又到青海省部队农场劳动和当山乡教师10年,一转眼在西北已经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对西北这个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况且,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前身兰大历史系,从它建系的第一天起,就在顾颉刚先生的带领和影响

下,注重西北地区史的研究,以服务于以其血与乳供养我们的西北乡亲。所以,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隋炀帝到青海的《拔延山考》,出版的第一部书是西北地理著作《据鞍录》的校注。后来,还出版了《西北史鉴》的专著,主撰过《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发表过数十篇关于西北的论文。最近十几年,我先后被选任甘肃全省人事工作监督员,民盟第八届中央委员,甘肃省民盟常委、文教委员会主任,第八届、第九届甘肃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在参议政治的过程中,根据费孝通老“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办实事”的教导,我主编出版了《千古兴亡史鉴丛书》,主持了一系列专题调研,撰写了许多文章,试图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专业能力服务于社会,效力于西北和甘肃。这些文字,也可以当做历史来看,是横的历史,是当代西北地方史的有用思考。

根据文章的内容,我将选入的论文划为三块:一是关于西北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论文,二是与西北有关的古代文化研究论文,三是当代西北和甘肃的历史反思文字和调研报告。每一类文章,大体按照其所述历史时代,或文章形成的时间排列。所选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也有部分未刊稿,这些都在文章末尾予以注明。个别与研究生合作的文章,也加注其名,以不贪没其功。

从这些文稿,大体可以看出我这几十年的治学特色和思想轨迹。其一,我比较偏重于历史的微观研究,而不擅长历史的宏观大论,这大概与我的秉性、师承和遭遇的学术氛围有关,无须多说。其二,我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学欠专攻。这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口舌。不过我的职业是教师,为了教好书而从事学术研究,是我长期的追求。而二十多年从事的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学,决定了我只能当个历史学方面的杂家,而不能去专攻某一方面。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教学得到了各方面,尤其是学生的认

可。我的学问用到了培养人才上,学术研究成果只是我教学工作的副产品。因而,我不以未能成为历史学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而遗憾。其三,我以为任何学术成果都是苦心耕耘的结果,治学要勤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笨鸟”更要比别人“先飞”,才能有所成就。我至今记得我的导师张孟伦教授大年初一还伏案治学的情景。所以我在做学问上花的时间比别人要多,几十年来周末和假日极少休息。为了研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西宁回民起义,我将320卷的《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认真读过一遍,做了数千张卡片。为了解释“钟鐻金人十二”的学术疑团,我在十多年中查资料,反复思考,最后看到曾侯乙编钟的实物才豁然开朗。其四,我以为,历史学是一门实学,一定要实事求是,凭材料说话,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造。考证文章,我做得比较多,就根源于此。我对伪学术深恶痛绝,写过一些批评文章,指斥学界的不正之风,包括至今鼓噪日甚的有关河西历史的一个问题,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这并不表示我要与人为难,而是不想误人子弟,欺骗大众。

最后,我要对郑炳林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是他主动提出为我出版这本论文集。我知道,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要出版一部个人的论文集是多么不易。况且,我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从来不低三下四地求人。更何况这是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大书!郑教授的学术眼光和慷慨大度令人感怀!

2006年元日著者谨识



目 录

历 史

幽地望考	(1)
秦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12)
“钟鐻金人十二”为宫悬考	(38)
酒泉地名的来历与酒泉酒	(48)
筑塞垣守卫边防 筹军食屯田西北	(58)
司马迁西部开发的实践和思想	(73)
驳古罗马军团安置骊靬城说	(85)
骊靬县名由来与设置年代检论	(102)
马援的功业和精神	(114)
氐族耕牧保据 仇池成为桃花源	(125)
拔延山考	(136)
唐先祖李虎与清水李虎墓志铭	(142)
元以前来华黑人考	(149)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161)
蒙元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173)
试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宁回族、撒拉族起义的原因和性质	(197)
1860—1873 年西宁回族、撒拉族大起义	(220)
大会门宦考辨	(233)
马归源历史考辨八题	(240)

以救国为己任的顾颉刚西北之行	(252)
黄河流域的农业和农业文明	(262)
关乎天下治乱的古代甘肃	(267)
化隆县历史地理概略及考证	(277)
化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民族斗争	(291)
略述青海省化隆县人口史(1745—1944 年)	(304)
华亭历史二题	(312)

文 化

畤祭原始说	(325)
“焚书坑儒”新析	(333)
紫泥用途及陇南贡品	(344)
排橐、革船和汤饼	(354)
皮筏是羌人的发明吗——与聪喆先生商榷	(361)
高原飞舟——皮筏	(367)
五凉史家刘昉与实录史体	(376)
关于《十三州志》的几个问题	(387)
为隋王朝重建一统文化的牛弘	(393)
藏族饮茶文化	(400)
头骨碗种种及其人文内涵	(408)
黑发、白发和假发	(414)
“道在屎尿”说厕所	(420)
狮子和狮子舞	(427)
河西古酒考论	(435)
贵州历代贡品考略	(448)
杨应琚和他有关西北的著作	(458)
《清史稿·杨应琚传》笺校	(468)

《豫师青海奏稿》补校	(476)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的撰述与价值	(496)
近代北方史地学要著——《辛卯侍行记》	(507)
三台阁的历史和传说	(517)
兰州大学首任校长辛树帜	(539)
忆江校长二三事	(544)
思晰渊微 门墙多杰	
——谨述赵俪生教授史学与教育成就	(548)
张孟伦教授周年祭	(558)
历史学家张孟伦教授学行	(561)

资 政

说古道今“父母官”	(564)
对甘肃省城市基础教育情况的调研报告	(571)
抓住机遇,放开手脚,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关于甘肃省民办教育情况的调查和发展对策 ...	(580)
西部大开发呼唤甘肃基础教育大发展	(601)
切实重视,积极努力,采取措施,稳步推进甘肃省企业自办中 小学校的改革	
——关于甘肃省企业自办学校改革的调研报告	(609)
关于确立兰州为西部大开发中心城市的建议	(621)
加快甘肃省民办二级高校发展的调研报告	(626)
贯彻国务院《决定》,大力推进甘肃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改革 和发展的调研报告	(633)
加强学生心理教育刻不容缓	
——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教育调研报告 ...	(644)
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是大学改革的核心问题	(665)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归属与保管	(670)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城市化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 问题	(676)
缩小八大差距 构建和谐甘肃	(680)



豳地望考

殷商时期,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定居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建立豳国^[1],积聚实力,争取民心,历经十余代,前后三百余年,到古公亶父时才迁往周原,最后成就王业。豳国是周族由一个西方小部族变成文明礼仪之邦的关键时期。古人说豳为“周家立国之本”,“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2]。弄清豳国的正确位置,对于先秦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豳的地望之前必须先给豳的概念定位。《史记·周本纪》言: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豳,既指不窋至古公亶父的诸位周先公所居“戎狄之间”的大范围的豳地区,又特指公刘、庆节至古公亶父所居的豳国、甚至其都城之豳邑。豳的概念之所以从大到小,是因为周人既居于戎狄之间,又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其所活动的范围必然较大,甚至有多次迁徙。本文所要考

证的,是公刘豳国都城豳邑的地望。

历代关于豳国的地望,有多种说法。

最早为汉栒邑县境说。班固《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下,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邑。”

第二种是稍迟于班固的东汉文字学者许慎的汉美阳(今陕西武功境)说。《说文解字》邑部载:“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美阳,在今陕西武功西北。此说当与汉宣帝时发现的一尊周鼎有关。《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宣帝时,右扶风美阳县发现一尊有铭文的鼎,京兆尹张敞释读鼎上文字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鸛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共32字,因汉人多有“栒邑,即豳地是也”的共识,可能许慎遂称豳在美阳。然而,鼎是可以移动之物。张敞已经明言,过去就有过鼎之出土处并不是原铸鼎处的事例,故将此鼎之出土处视为是周栒邑即豳国之所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美阳在岐山东南,而先秦文献称豳在岐山之北,将美阳释为古之豳国,与史书所记方位不符。许慎此说不为历代学者认同,惟齐思和先生以该说为是,言:“以豳在渭上(即今武功东北)最可信据,而从无敢从之者。习非成是,积重难返,可慨也已。”^[3]

第三是汾城(今山西新绛)说。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首先提出此说,认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邠,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4]到他1939年成书的《国史大纲》中更明言:“窃疑邠在山西汾城,踰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5]汾城,在今山西新绛。近代史学,好新奇,倡独创。钱穆先生山西汾城说一出,就为不少治先秦史的先生信奉。考钱穆先生此说,恐受汉晋人《汉书》注的启发。《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下注有:

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瓚曰：“《汲冢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瓚说是也。此枸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

按，应劭、臣瓚所言之郇或荀，实为二地，颜师古已言明，《通志·氏族略》辨之甚详。其《氏族略二》云：“郇氏，周文王之子封郇侯，或言第十七子。郇国故城在邠州三水东，其后以国为氏。郇音荀，一音环，今有环音之氏，而未闻荀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二十四注：“解县西北有郇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2页言：“郇，地当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不远之地。”则《左传》所述春秋之郇邑在今山西临猗一带。《氏族略三》言：“荀氏，晋之公族也，隰叔之后。荀邑在绛州正平西十五里。荀本侯国，姬姓，晋灭之，以为邑。荀侯之裔，亦以国为氏。”则荀在今山西新绛东北，与郇为另一封邑，在另一地。显然，不能因为春秋时在今晋南有郇或荀，就断定西周初之郇邑不在今陕西省境。上引汉宣帝时美阳出周鼎，证明此鼎所言郇邑应在关中及其附近，不可能在远至千里之外的晋南。况且，古代地名随封（邑）君迁徙而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在今陕西华县的郑，东周初迁至今河南新郑是一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言文王子十六封国中的毛，“毛公鼎、毛伯敦盖并出扶风，似可推知毛公采邑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6]，也是一例。钱穆先生以晋南新绛释邠（豳）国地望，无法圆满地解释《诗经·公刘》及《史记·周本纪》所言与邠相关的溷原、隰原、皇涧、百泉、鬻、南岗、漆、沮、渭、梁山、岐等地名，实难成立。

班固去古未远，其邠在西汉枸邑县境的说法为历代经史学者所认同。东汉郑玄《诗谱》笺说：“邠者，后稷之曾孙也公刘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枸邑。”^[7]西晋张华《博物